

现代
西方哲学
讲演集

· 贺 麟 ·

责任编辑 宋慧曾
封面装帧 许明耀

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

贺麟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4.5 插页 2 字数 311,000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4,000

书号 2074·420 定价 (六) 1.45 元

序

周 谷 城

我与贺麟同志的接触，自解放后，特别多起来。他是专攻哲学的，对黑格尔哲学有深刻的研究，尤其介绍黑格尔逻辑很有功劳。我是研究历史的，也很重视哲学。解放后，我到北京的机会多了；每次到京，几乎都要找他谈哲学，打听学术界对黑格尔哲学翻译介绍情况怎样。我在五四运动时期，对各种思想，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等，都想研究，对各家哲学，如柏格森、罗素、詹姆斯、杜威等的著作，都想钻研。当时年轻，有些自命不凡，甚至有些狂妄；总以为多读些书，由博返约，总有一天可以自树体系，成一家之言。事情真有些凑巧的地方，我这样作，居然组成了一个体系，后来商务印书馆于一九二四年把我的书印出来，书名就叫《生活系统》。

不过历史发展很快，革命形势逼人，不能让我关起门来讲系统。于是下定决心钻研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九二一年春到湖南第一师范教书时，便以邮购的方法，向日本东京丸善株式会社买《资本论》两套，一为英文本的，一为德文本的。当时毛泽东同志在一师附小任主事，看我读这类的书，半庄半谐地对我说：“你看这些，不怕惹麻烦吗？”我说，“该不会惹什么麻烦吧！”其实我

错了，他的话是对的。后来，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我参加了，曾任省农民协会顾问，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师。贺麟同志说我参加革命较早，大概是指此。当时我在长沙曾发表两篇《论租谷》的文章，其中引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颇引起教育界同人的讥讽。一九二七年春到武汉，毛泽东同志找到他自己所领导的全国农民协会任干事，做一点宣传工作。承他鼓励，又发表了一篇《农村社会之新观察》的文章，其中也引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反响极好。但麻烦就发生在这里。宁汉分裂以后，湖南反动势力抬头，就有人利用我写的几篇文章，要给我以麻烦。幸喜我已由武汉到了上海。一九二七年秋到一九三〇年春，我在上海以卖文及译书为生，并在中国公学兼了几点钟课。因受到朋友的鼓励，对中国社会历史及革命理论的研究，又迫使我不得不从《资本论》的学习，上溯到黑格尔逻辑问题。

一九三〇年春，到中山大学教书，并兼社会学系主任；有了职业，生活较稳定了，有暇就到图书馆找黑格尔的书，书很少，大概是哲学系的先生借去了。我仅找到一本文德尔班的《哲学史》，其中述黑格尔哲学颇详；找到一本《黑格尔论文选集》，其中有哈里士(Wm. T. Harris)英译《黑格尔逻辑大纲》一篇；找到一本瓦拉士(William Wallace)英译《黑格尔逻辑》，也就是所谓《小逻辑》。此外找到一本麦塔加(J. E. McTaggart)的《黑格尔的辩证法研究》，及另一本《黑格尔逻辑述评》。麦塔加的两本书，文字简明流畅，我曾想择一译成中文。后想译他人的研究之作，远不如译黑格尔本人之作的重要；于是先取哈里士的英译《黑格尔逻辑大纲》译成了中文。然后又把瓦拉士的英译《黑格尔逻辑》进行翻译。只译了一半，因与几位进步教授讲了马列主

义，遭学校里反动当局的疑忌，于一九三三年被迫离开了中山大学，到上海国立暨南大学任教授，并兼史社系主任。这时也已有了职业，生活安定，一方面努力编写《中国通史》，另一方面则想进一步钻研黑格尔哲学，尤其是黑格尔逻辑。当时曾在上海一家外文书店，名叫壁恒公司，买了黑格尔的《逻辑科学》两卷，《艺术哲学》四卷，德文本《小逻辑》一卷；列宁的《黑格尔笔记》英文、德文对照本一卷，自己又从朋友处借到了《逻辑科学》的德文本，更承朋友送我一本德文的《历史哲学》。原来在中山大学翻译的《黑格尔逻辑大纲》也用中英对照印出；《小逻辑》译稿一半约计二万字，也曾托《思维月刊》代为分期发表，只是因为《思维月刊》被反动派压迫停刊，译稿随着遗失。《逻辑大纲》曾于一九五二年由商务印书馆重印，我在重印的序言里曾说：“黑格尔著作中，关于逻辑的，可寻出三套：一曰《大纲》二曰《小逻辑》三曰《逻辑科学》。这三者体系都完整，只内容有略与详之不同，读起来，自然以由略而详为方便。”

我以为研究历史，学习革命理论，不能不上溯到黑格尔的逻辑问题。贺麟同志研究哲学，对黑格尔哲学有深刻研究，尤其解放以后，因所译《小逻辑》获得读者好评，对革命理论的研究极为诚挚。他在《小逻辑》译者引言中曾说：“解放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参加北京哲学界人士的哲学交流会和批判旧哲学的座谈会（经常每两星期举行一次），得到不少新的启示和鼓舞。”我与贺麟同志研究理论的重点固不相同，进行的程序也不相同，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学理论，则完全一样。不独止此，在学习方面，我们两人曾共同亲自受到毛主席的鼓舞。记得大约是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上午，我因参加全国人代会在

北京，有一天毛主席召我到中南海，这次与平常不同，汽车从新华门进，进门后守卫的同志还举枪致敬。车行至露天游泳池旁边，同毛主席略谈了一会，两人又同车回到丰泽园，开始长谈。毛主席问我，“北京教育、学术界有什么朋友同你谈得来？”我答曰：“有贺麟、郑昕、冯友兰、金岳霖等教授。”主席随即命工作同志把这几位召来，然后又把胡绳同志和中国人民大学两位搞形式逻辑的青年同志也召来了。我自己早九时就到了中南海；其余各位在十时左右到齐了，每人刚进门，毛主席即起而与他握手，相与欢谈。开始进午餐时，毛主席笑着说，“今天我请老朋友周谷城吃饭，请大家作陪。”其实主席重视知识分子，早想同大家聚谈；这样一说，使大家更加轻松愉快，能畅所欲言了。饭后谈到三点多钟时，大家还兴致勃勃，似有许多未说完的话。毛主席也毫无倦容。当时，我才插话说：“我们今天不要使毛主席太劳累了。”毛主席接着说：“好！今天就谈到这里了。”于是大家陆续起而告辞；毛主席还送我们出大门，凭对中南海水波，一一握别。胡绳同志嘱我乘他的车子回宾馆，其余各位则由中南海告别毛主席，乘车回家。这一次的座谈小宴，使大家高兴极了；所受的鼓舞也是很容易忘记的。

大家受到领导的鼓舞，学习理论的热情都是很高的；而贺麟同志则更积极，大有尽弃所学，专读马列、毛书之概。记得，大约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左右，他有一次参加政协组织的参观学习团，路过上海，顺便到我家谈天；看到我书架上乱七八糟的书，几乎全是老古董；抽一本看，是柏格森的《物质与记忆》；再抽一本是柏格森的《时间与自由意志》；再抽一本则是詹姆士的《极端的经验主义》。他不抽了，笑着对我说，“尽看这些！”这不是他对我

的讥讽，也不是他对我的恭维；而是当时他和我的遭遇大体相同，所引出的同感！这同感的里面有一个深刻的意思，即大家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点，贺麟同志做到了，现在他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最近所编《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特别是下篇，可以说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而编成的。这本书的优点很多，我所特别重视的有三点：第一，每一章自为起迄，首尾连贯自然，任取一章阅读，都可以很畅快地读下去，没有顾此失彼的麻烦，方便极了。第二，各章的排比，彼此之间，仍具有系统性，而且系统性很强，例如詹姆斯与杜威连述，柏雷、摩尔、罗素、亚历山大、怀特海等连述，都是明证。作者自己本来就是很重视哲学史的，这本讲演集大可以作为现代西方哲学史的入门书，也可以作为现代西方哲学史的补充读本。第三，凡有可以引起误解，甚至导入歧途之处，则不厌麻烦，详加分析批判，使人毫无误解之余地；例如，对新黑格尔派的分析批判，以及对实用主义的分析批判，就是明证。尤其对实用主义的批判，作得特别好。首先把实用主义分为古典的现代的两种，实事求是地予以批判。对古典实用主义的错误理论，一一指明，对其稍有可取之处，也不抹煞；对现代实用主义容易引起误解之处，如思想方法之被人误解为有唯物辩证法的因素等，则严格指出，毋使以讹传讹。然后将两者相关之处，说得清清楚楚，尤其对两者各自的优缺点的评价，措词极为谨慎，极有分寸。是批评中所少见的好文章。实用主义哲学家中，杜威好讲思想的五步；他在《实验逻辑论丛》中讲五步，在《民主与教育》中讲五步；在《思维术》中讲五步。所谓五步，大意不过是思想起于疑难，然后确定疑难的性质，然后提出

解决疑难的方案,再把方案付诸实践,最后疑难得到解决。这样的五步,严格说来,只是主观行为完成的过程,不是客观存在发展的法则。而且五步云云,并不是固定不可移易的;扩大到七步未尝不可,缩小到三步更是完全可能的。席勒(F. C. S. Schiller)论真理,其实就是论假设,便提出三事,曰真理的要求,真理的证明,真理的可靠(Claim of truth, Verification of truth, Validity of truth)。提出一个假设,总希望它或要求它能变为现实,这就是真理的要求;假设付诸实践,能牵引着行为向前迈进,就叫真理的证明;行为前进到了尽头,假设变成了现实,就叫真理的可靠。真理可靠之日就是假设实现之时;假设实现之时就是行为完成之日;行为完成之日就是真理消灭之时。在行为过程之中,有假设的吸引,在行为过程之外,没有真理的存在。我的看法如此,不知贺麟同志以为如何。全书拜读一遍,所得启发很多;略抒己见如上,即以为序。

一九八三年五月一日于上海

序

姜 丕 之

贺麟教授的《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即将出版，他希望我能在这书写篇序言，这使我很高兴。高兴的是这部包括现代西方哲学许多流派代表人物的讲稿终于汇集出版，为我们研究现代西方哲学以及了解我国以往在这方面的研究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至于写序言，由于自己的知识有限，对现代西方哲学缺乏研究，恐怕难以胜任。但既受作者的委托，作为一次学习机会，我倒愿意从命。借此机会，回忆一些往事，并说说自己的读后感，以便就正于作者和读者。

现在先从回忆我与作者的交往谈起。我于五十年代中期与贺麟教授相识，当时他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组的组长。从1958年开始，我担任这个组的副组长。在相处七年中，得益于他之处甚多，我一直把他看作是自己的良师益友。记得1956年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便爽直而又谦虚地说，我们两人可以互学互助，很好地合作。但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我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

贺麟教授那种乐于助人和诲人不倦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刚到哲学研究所的头几个月，几乎每隔一个星期

便到他家里谈一次，主要是谈读书心得和请教疑难问题。有时他也拿一些他的旧作或讲稿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每次一谈就是半天或一个晚上。有一次谈康德哲学一直谈到午夜才分手。我和组内几位青年研究人员，不仅一起听过他在大学里的讲课，而且还利用晚上时间到他家里听他逐字逐句地讲解英文本《精神现象学》的序言（这时中译本还未开始翻译，这篇序言长达五十页，相当于一本小册子）。据我所知，凡是写信或登门向他求教的，他都不辞辛苦地热情帮助。在培养后继者方面，他做了很多工作，有不少成绩。六十年代初，我在写《黑格尔〈小逻辑〉浅释》时，曾多次向他请教，他从不当成额外负担。有些问题还各抒己见，相互讨论。在组内讨论我的初稿时，他更是积极发言，讲了许多鼓励和支持的话。他对组内其他同志也是这样。当时组内有一种定期轮流作学术报告和集体讨论一些学术问题的制度，他每次都到会主持或发言，并鼓励大家作进一步研究。

贺麟教授为人正直、朴实，比较平易近人。他总是积极参加所里或组里的一些活动。1958年，我们曾一起同中国哲学史组、西方哲学史组和逻辑组的同志们到河南七里营劳动、学习。他在劳动中总是不甘落后，抢着干。我因病提前回北京住院治疗，他一直坚持到底，为期两三个月。据我所知，在这之前，他于1950—1951年春曾到陕西长安县参观土改一个月，于1951年秋至1952年春到江西参观土改半年；1965年又参加全国政协参观团去江西丰城县参观、学习，路过上海时还来看过我，这次他还参观了南昌起义纪念馆，并拜谒了井冈山革命圣地，受到深刻的党史教育。这些对他的世界观的转变都起了积极作用。

全国解放后，他一直受到党的关怀，热爱党、热爱祖国，努力

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即使在三年自然灾害和困难时期，他也毫无怨言，照常埋头于研究和译著。在十年动乱中，他虽受到迫害，但对党和人民的事业仍然具有充分的信心。“四人帮”垮台以后，他虽然年老多病，但心情愉快、精神振奋，更加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自己的研究工作，更加努力地译著和培养新生力量。1981年，他荣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的名誉会长，对学会的工作和活动十分关心，受到会员们的好评。今年（1982年）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他认为应重新开始，更要虚心学习，积极工作，并在实践中加强党性锻炼，正象他对新华社记者表示的那样，决心把余生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这种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关于本书的内容和汇编的经过，作者在自序和后记里已经作了说明。简单说来，本书包括两个时代两种探索的成果，二者之间成为鲜明的对比，从中可以看出作者随着世界观的改变而改变自己的学术思想。他在下篇的首篇《加强对西方现代哲学的研究》中，关于我国两个时代的西方哲学研究作了对比，读者不妨先从这一篇读起。关于解放前的情况，他说：“这些外国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在中国的代表，他们还不安于简单地神贩、传布，他们还想进一步加以‘中国化’，使他们与中国传统的封建哲学思想相结合，所谓‘以旧瓶装新酒’，以便更好适合于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反动统治王朝的需要。”关于解放后的情况，他概括为三点，特别注重的是第三点，即：“人们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批判自己过去所散布的唯心主义思想，参加批判西方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工作。虽然工作做得不够多不够好，但大方向没有走错。”应该说，这些看法比较合乎实际，也可以说是

作者自己的写照。总之，全国解放后，他的转变是可喜的，成果是可贵的，是值得读者注意的。

贺麟教授是国内研究黑格尔哲学的老专家、老前辈，但他不只是研究黑格尔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同时也研究其他西方古典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比如，他对斯宾诺莎哲学和英、美新黑格尔主义等也都很有研究。斯宾诺莎的代表作《伦理学》以及《致知篇》的中译本，都是由他翻译出版的。又如，本书下篇中关于新黑格尔主义的论述和批判占的篇幅最多，内容也比较充实、深刻，足见他在这方面的功夫较深。他于1926年出国留学，1931年回国任教，从那以后，一直从事西方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研究、教学和译著，这方面的情况，他在《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兼谈我对介绍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回顾》（刊于《中国哲学》第二辑）一文里，有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多说了。

这里我想简单说说我对本书的几点粗浅的读后感。总的印象是，内容丰富，有自己的特点，文字也比较流畅，读起来既有趣又能引起思索。具体说来，本书不仅介绍了某些在我国有影响的哲学家（如柏格森、詹姆士、杜威、罗素等），而且也介绍了某些在我国影响不大而在外国影响较大的哲学家（如爱默生、怀特海、桑提那、布兰夏尔德等）。在写法上也比较活泼，一般的都有生平简介和主要著作评述，有的还有轶事趣闻，以及著者与某哲学家（如怀特海）的交谈情形。这些都使我发生兴趣，我相信读者也会发生兴趣。在分析评论方面，作者采取边叙边议、最后加以小结的写法，特别是作者能向读者交心，不论是称赞或批评，都直言不讳，自己有什么看法就说什么看法，不泛泛而谈，不一般化，这正是本书的重要特点之一。有时还和中国哲学联系，

即使象上篇中出于错误动机的联系，也可以使我们从中更清楚地看出作者当时的思想观点。这也是本书（主要是上篇）的一个特点。更值得注意的是，下篇在分析批判方面，作者力求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在这方面的思想转变和发展。特别是关于实用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的批判，表现得更为明显。

上篇关于杜威和怀特海的论述，可说是具有代表性的两篇。

关于杜威，作者认为他是“工业时代独树一帜的哲学家”，他重实效，推崇经验，但“他的哲学最后是茫然无所归依，到方法论为止，再没有旁的深厚的方面了。”这显然是说杜威还神秘得不够。作者把杜威的哲学渊源归纳为三点，即黑格尔派的学说；进化论；美国文化。杜威整个系统就是这三者的融合体。作者在扼要分析杜威关于实验逻辑划分的五个步骤之后，指出杜威对实验方法的心理分析，可说是辩证法的心理学化，使它失去原来的逻辑意义。作者当时对辩证法的看法是：“辩证法本来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精神生活里的体验，体验出事情的矛盾，求得解决，然后又生出新的矛盾，这样不断地发展下去。另外一方面就是纯粹的辩证形式，纯粹的逻辑。”把辩证法只看作是“精神生活里的体验”和“纯粹的辩证形式”，这是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糟粕，抛弃了它的精华，反映作者接受了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但比起一般新黑格尔主义者千方百计地抹煞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石——矛盾，却高出一筹，因为作者承认事情是在不断出现和解决矛盾中不断地发展下去。书中在论述柏格森哲学时也说：“黑格尔的辩证法里有矛盾的统一，有设身处地、体物入微式的体验，但是他主要的还是在求出有机整体的节奏，所以他是入乎其

中,超乎其外,终于还是加以扬弃,以求取宇宙间的大经大法。”这里所谓“入乎其中,超乎其外”,也就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壳,即绝对精神的异化(或外化)和回归;所谓“大经大法”就是规律。当时作者虽然是从唯心主义方面阐述的,但也说明作者对黑格尔辩证法中的矛盾和规律还是比较重视的。当然,那时还不可能批判地掌握它的实质。作者对杜威关于传统哲学的批驳,基本上持批判态度,只是对他指责传统哲学那种改变内心的自欺式作用,予以肯定,并称赞他“颇中要害”,这也是值得注意的。大家知道,杜威在1929年出版的《确定性的寻求》和《经验与自然》两本书里,曾大肆宣扬他的“方法至上”论和所谓“经验的自然主义的方法”。他所谓“方法至上”论即“心灵至上”论,用他的话说来:“心灵及其器官是超自然的或在自然以外的。”^①他所谓经验是“兼收并蓄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不承认动作与材料、主观与客观之间有何区别,但认为在一个不可分析的整体中包括着它们两个方面。”^②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方法只能是主观唯心主义的。

关于怀特海,由于作者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书时听过他的课,并当面交谈过,所以书中的介绍特别详细。作者称他是半路出家的、综贯诸家而又超出诸家的现代哲学界的大师。不难看出,这和怀特海哲学思想中有些与黑格尔接近之处,如强调全(或整体)和内在有机联系,主张用玄思(或思辨方式)来建立宇宙论、本体论等等,是分不开的。同时,怀特海还特别称赞柏拉图,这

① 杜威:《确定性的寻求》第九章。

② 杜威:《经验与自然》,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0页。

也与黑格尔接近。作者特别重视怀特海反对四种概念，即反对“空疏的实有”、“单纯的地位”（指空间和时间）、“自然的两极化”（即分成孤立的两部分——感觉到的实在和由理智推出的原因）、“对于心理的附加”。作者在分析了怀特海的意识学说之后，把怀特海看成属于新谢林学派。姑且不论这种划分是否恰当，但从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神秘主义来说，怀特海与谢林确实有某些共同之处。当然，这和作者的原意是两回事。作者最后对怀特海的两点结论显然是唯心主义和过于夸张的了。大家知道，怀特海提出的所谓自然机体论的假说，只不过是唯心主义的虚构。他用机体代替了物质，还有什么科学可言。他公开声称：“机体论的自然哲学必须从唯物论哲学所要求的东西的反面出发，……这样达成态就能在过程中保持自我同一而成为一个事实。”^①他在另一本书中还说：“我所主张的学说就是，自然和生命两者都是不能理解的，除非我们将其作为构成‘真正实在的’东西的组成中的主要因素把它们溶合在一起，而这些东西的相互关系和个别特性就构成了宇宙。”^②同时，他把自然界和“经验”等同起来，对他来说，哲学的目的不是别的，只不过是就活动的先验作用来洞察活动的盲目性，这是十足的唯心主义。他的哲学体系，可以说是客观唯心主义（主要表现在本体论上）和主观唯心主义（主要表现在认识论上）的杂拌。总之，怀特海打着科学与哲学结合的旗号，贩卖神秘主义、唯心主义的东西。当然，他强调自然界是一个变的过程，也有某些辩证因素。

① 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146 页。

② 怀特海：《思维方式》，转引自《分析的时代》，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第 83 页。

下篇关于实用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的批判,是很有特色,并具有一定深度的。

关于实用主义的批判,作者选入了四篇文章,其中以《读艾思奇同志〈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的一些启发和意见》(1955年)和《胡克反马克思主义的实用主义剖析》(1962年)两篇更有特色、更为有力。前篇从方法论上揭露和批判了胡适的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谬论,观点鲜明,论据充分。作者进一步发挥艾思奇同志对胡适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论的批判,概括成以下三点:

“一、大胆虚构,大胆武断,——这是最狂妄的方法。

二、现象罗列的方法,——这是最肤浅的方法。

三、诡辩,亦即奇怪的逻辑,——这是最凶恶的方法。”

作者还在艾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胡适的所谓“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从正面对艾文作了解释和补充。

在《胡克反马克思主义的实用主义剖析》一文里,对胡克早期的、迷惑作用较大的代表作《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揭露和批判,是很重要的,它说明胡克反马克思主义是由来已久的了。文中揭露了胡克所以大肆吹捧杜威是有他的目的的,是想把杜威作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面黑旗。文中还联系批判了杜威的哲学思想。这和上篇关于杜威的论述形成鲜明的对比。还要指出的是,文中对胡克于50年代末出版的《政治权力与个人自由》一书的批判,说明作者已经自觉地、理直气壮地起来捍卫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制度了。作者认为,“哪里有革命,哪里就有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指导的原则。谁要革命,谁迟早都会接受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战无不胜的革命的理論武器。”这可

以说是作者自己亲身感受的经验之谈。

关于新黑格尔主义的批判，也是有特色的。作者先分别批判了几个代表人物及其著作，然后再作一总的批判。在总的批判中，着重批判了他们的哲学观、政治思想和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形而上学化和神秘化。最为重要的是最后一部分的内容，把新黑格尔主义的主要特点揭露出来了，把他们如何歪曲和糟蹋黑格尔辩证法的许多言论揭示于读者面前。最后得出结论说，新黑格尔主义是从右边从反动的方向去“发展”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这是一条没有前途的道路；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高度批判地研究康德黑格尔哲学，才是正确而有效的道路。

以上说明贺麟教授在治学态度上严谨、认真；不空谈，而注意掌握材料；不落俗套，而有自己的见解。当然，这在不同的时代和道路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他不讳言，他对哲学史上有地位的、传统的古典唯心主义是很有感情的，这从本书上篇的各次讲演里便可看出，他对现代西方哲学各流派都有不同程度的同情。这是由于各种因素形成的，是可以理解的，正象他自己所说的，当时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觉醒。人是可以变化的，他的经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随着思想认识的变化，感情也是会变化的。一个人的思想的根本变化，即世界观的转变，决非一朝一夕可以奏效的，往往要经过曲折、坎坷、考验的过程，才能逐渐有所进展的。全国解放后，由于他真心真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接触新事物，这才逐渐抛弃旧思想，树立起新观点，这个转变既是痛苦的又是愉快的。从解放后他的讲稿和文章里，也可以看出这个转变过程。比如，《小逻辑》的《新版序言》（1980年）和最初的《译者引言》（1954年）相比，《精神现象学》的《译者导言》的修